



姜树茂 中短篇 小说选

JIANG SHU MAO
ZHONG DUAN PIAN
XIAO SHUO XUAN

青岛出版社

姜树茂中短篇 小说选

姜树茂中短篇
小说选
PDF

责任编辑 王永乐

封面设计 姜竹青

姜树茂中短篇小说选

*

青岛出版社出版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潍坊计算机公司激光排版实验印刷厂排版

山东临朐印刷厂印刷

*

1991 年 4 月第 1 版 199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32 开(850×1168 毫米) 15.375 印张 2 插页 384 千字

印数 1—2000

ISBN 7-5436-0636-4/I·80

定价:6.85 元

自序

姜树茂

童年做过许多金色的梦，但从未做过当作家的梦。而后来竟然成了作家，实在是命运之神对我的恩赐，现在，似乎依然没有走出朦胧圈，常有惶恐之感。我总是以怀疑的目光看待自己的作品，审视所走过的路程，在满意不满意之间徘徊挣扎。

我于1933年12月生于莱西县茂芝场村。上小学时，正处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平日读旧政府规定的课本，日本鬼子来了，连忙把它藏起，拿出汉奸政府发的宣扬“中日亲善”的书摆在课桌上。除了读这两种课本外，我曾在外祖父家寻了本破旧不堪的《千家诗》，囫圇吞枣地背过几首，除此，连本小人书也没看，几乎与文艺无缘。家乡解放后，我第一次接触文学作品是1946年春天，在水集新华书店买了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原以为是本炼钢的科技书，读后方知是小说，至于小说是怎样写成的，那是后来才知道的，所以说童年从未做过当作家的梦。但是，从读过这部长篇小说后，保尔·柯察金的英雄形象一直鼓舞着我，激励着我奋发向上。

我参加革命那年才15岁，初中读了不到一年。但在当时的干部队伍里，也算是个“小知识分子”了。青岛解放初期，我长期在郊区工作，由于工作的需要，经常把遇到的新人新事写成新闻通讯发

表在省、市报纸上，继而又写了许多人物特写，直至这时，我也没有想将来当作家，只觉得有一门写作的本事，对工作有好处。由于文字功力太浅，知识范围狭窄，当时写的那些“豆腐块”文章错字连篇，语病百出，多是经过编辑加工才发表的，要进行写作，难度实在太太大，怎么办呢？“笨鸟先飞”，我把古人讲的“才需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坚信只要坚持不懈地学，勤勤恳恳地练，是会取得些成绩的。

我先从读书开始。书海茫茫，浪花朵朵。世界上的名著浩如烟海，但我没有望洋兴叹，有一点时间，就读一点，一分一秒我都不放过，并且坚持上完业余大学中文系，我不仅阅读中外名著，也读辞典。时间久了，日积月累，既提高了自己的审美能力和文化素养，也学到了一些创作知识。

在坚持读书的同时，我积极练习写作，不会写的字，就查字典；不会用的词，就请教别人。写完了，改完了，就往报刊编辑部寄，可稿件寄出不久，就被退回来了。再写，再改，再寄，结果仍被退回。但是，我不怕碰钉子，不怕走弯路，因为我知道搞任何事业要取得点成绩，是不会一帆风顺的。天才十分之九是勤奋，是毅力，要成功必须靠自身顽强的努力，不能靠侥幸、碰运气，所以我没有因为多次失败而罢休。一篇小说我常常起十几个头，多次大改，然后对照比较，取长补短，甚至连一个标点，一句对话，我都认真推敲，直到满意为止。冬去春来，花开花落，在学习写作阶段，也不知花费了多少纸张和墨水。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我走向文学道路的准备本来就不足，又没有太多的灵心和才气，只是有苦苦的韧性的追求。信心出力量，毅力出成就。1954年春天，我终于在《青岛文艺》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牲口的风波》。

一面读书，一面不断地坚持写作，深入思考钻研，这要花费很多的时间。50年代，无论在机关还是在基层，工作都是非常紧张的。作为“业余”作者，首先应当把工作搞好，完成领导上交给的任

务。创作没有时间，我就挤时间，不逛马路，不逛公园，不打扑克，不下象棋，不讲吃，不讲穿，早起晚睡，一天当两天用，一年到头我从未歇个星期天。节日里的音乐、舞蹈和各种娱乐活动，对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该有多大的诱惑力啊！但我强制自己：不参加。就连平日看一场电影，我也要掂量再三，因为我需要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坚持不懈地学，勤勤恳恳地写。有时坐着写累了就哈趴在床上写。酷热的中午浑身出汗，我就把脚放在冷水盆里，头上顶着湿毛巾；严寒的深夜，写得困了，就用冰溜块擦擦脸，提提神再写。一年四季，我都坚持早5点起床，写作两小时后上班，晚上写到11点。出差开会，我也拿着稿子，带着书，见缝插针，一有空就学，就写，决不让时间白白流逝。我从那时起，就逐步懂得勤奋的价值，哪天不看几页书，不写上几百字，心里就空虚，总感到欠缺些东西。有时刚躺下，忽然想起个情节，或者几句对话，就立即翻身下床，记录下来。有时睡着了，还在梦里想情节，编故事，偶尔还编得挺好，用到作品里去了，大概这就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想”吧。

经过一阵子奋斗，我又陆陆续续在当时有影响的刊物《萌芽》、《文艺月报》上发表《小会计》、《两个女人的命运》、《评级》等多篇小说，出版了儿童故事集《园艺姑娘》（1956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短篇小说集《捕鱼的人》（1959年山东人民出版社）。

《捕鱼的人》出版那年，我25岁。我在后记中写道：

我生在大沽河畔的一个村庄里，参加革命时，还是个十几岁的无知的孩子。党像慈母一般，教养我长大成人。当我开始写作时，党组织和周围的同志给了我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关怀和帮助。我遇到困难，他们支持我，向我伸出了友谊的手；我有了进步，他们鼓励我，告诉我不要自满；我有了缺点，他们批评我，给我指出前进的方向。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阶级友爱的温暖的革命大家庭里成长起来，现今还在这里面继续成长着。如果说，我今天在文学创作上

有一点点成绩的话，那都应当归于党，归于人民，归于关怀我成长的领导和同志们。……

这个集子，正和我自己一样，流露着年轻稚气。但是，在党的亲切教养下，今后我有决心，加强马列主义学习，积极投入火热的斗争，提高政治艺术水平，永远不自满，不骄傲，勤勤恳恳地写下去，歌唱我们这个伟大的英雄的时代，和我们亲爱的社会主义祖国一块儿大踏步前进。

这个后记是我50年代学习写作及其思想感情和所走上文学道路的真实写照。像我这样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年轻人，竟然能写出小说出了书，全是党的教导和培养。这话现在若干年轻人听来会觉得是“老八辈”，又在“忆苦思甜”，但事实就是如此。五六十年代的党组织和文学前辈对文学青年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出了两本书也没有叫你“作家”的，只称你“青年作者”或“业余作者”。一直到后来出版《渔岛怒潮》后，偶而有人称我为“作家”，我都觉得脸发烧，深知“人类灵魂工程师”这顶桂冠不容易戴，你的人品、作品都应该与这个高尚的称呼相符。而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当你取得些成就，单位领导和文坛前辈除了给予必要的鼓励，更多的是把你视为普通党员，对你提出严格的要求，指明前进的方向：像如何对待人民，如何深入生活，如何做好本职工作，搞好“业余”创作，如何刻苦钻研业务，如何去进行艺术探讨等等，态度是严肃的、真挚的。我现在所以还能在文坛上做一点工作，写一点文章，就来源于组织上和一些老前辈对我们那代年轻人的严格要求。

1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我认为这不仅是指创作题材、素材的源泉，也是作者创作智慧和创作力量的源泉。}50年代我在青岛郊区经历了剿匪反特、土改、镇反，及互助合作运动等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当时共和国诞生不久，人民群众由三座大山压榨下的奴隶，变成世界大国的主人，他们充满了由衷的喜悦，对党和人

民政府的赞歌到处飘扬，纷纷按照毛主席的指引组织起来，走由穷变富之路。当时我吃在农村，住在农村，与农村基层干部一起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农村，生活中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每天都使我激动不已，而对在工作中出现的困难和失误，又和基层干部共担忧愁。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时代使命感驱使着我，借文学抒发感受，为人民代言、为时代发声而写成一个个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多是围绕着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后以“公”与“私”互相交战为轴心、人的精神面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热情讴歌了人们为建设新生活而焕发出难以遏止的热情，描绘了人物公而忘私的优秀品质，特别是在五星红旗下成长的那些青少年们，像《“7”号和“1”号》中那个有点调皮但善于以幽默的方式克制自己的初中毕业生周法成，《小会计》中的高小毕业当了现金会计时还贪玩打扑克的陈小英，还有立志献身于祖国园艺事业的《园艺姑娘》，有的则歌颂了敢想敢干的年轻一代（如《新女婿》、《光荣的烙印》等）……他们身上的公而忘私，乐于去闯新生活，乐于为新中国大厦添砖加瓦的精神，不仅在共和国诞生的初期，就是在华夏大地建设社会主义已经40多个年头的今天，也是非常可贵的。这是我对当时的火热生活作了一点真实性的描绘，现在读来，还觉新鲜有味，拂去尘土，依然放光华，它起码可以提醒我们记住那闪光的年华，闪光的风范。一切向钱看，私字当头，搞不成现代化。50年代尽管有一些“左”的阴影，但人们为了使祖国昌盛所表现的高贵品质却值得大书特书，发扬光大。所以我编选这个集子时，也收入50年代所写的几个主要短篇小说，尽管它在艺术上还很稚嫩、单薄，我也保留了。

前几年，中国文坛掀起一股“否定一切”、“否定十七年”，割断历史的思潮。一提起“十七年”的当代文学，有人恨不能什么都一概否定，这实在是应该的。

我的文学生涯一开始就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进行的，这有利于引导我贴近生活，服务现实，和时代

共命运,注重文学的教育作用,但也形成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论”美学观,忽视了文艺的自身特点和美学价值。《捕鱼的人》和《园艺姑娘》两个集子,既是50年代的产物,就不能不打上把小说当宣传品的时代烙印,政治说教味比较强烈和直露,许多短篇又写了多属政治失误性生活(如大跃进,浮夸风),明显带着“左”的色彩,字里行间或多或少刮一点一“大”二“公”的“共产风”,带有当时文学偏向的普遍性。这次编选时,对保留的作品我只做个别文字的修正,仍然保持原貌,因为那已成为历史了。

二

如果要把自己的创作分阶段的话,我将50年代作为“初级阶段”,或者叫创作初期,而六七十年代,则进入创作中期,主要标志是写了两部长篇小说《渔岛怒潮》和《渔港之春》。

熟悉我的同志都知道:我这人“胸无大志”,不善幻想,更无大的渴求(这或许是自身的条件所决定),当然,也不固步自封,没有追求,只是凡事喜欢立足现实,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一步一步的来,而一旦认准的目标,一定要达到。我的文学生涯也是这样,写了新闻,我想写通讯,之后,我开始练着写人物特写(现在叫报告文学),摸了一些门道,这才开始短篇小说的创作。写了几年短篇,练了笔,积累素材,进入60年代后,便开始长篇小说的创作。这两部长篇小说,都是写海,反映渔民生活的。

也许是因为我50年代初期在海边工作,跟渔民结下深厚的情谊,之后又长期生活在青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出门是海,抬头见海,进一步与海结下了不可分割的缘分。我爱大海。人类的远祖来自海洋,那宝蓝的天空一样辽阔,那惊涛骇浪蓬勃的奋飞,豪迈奔涌,那穿过黄沙与峡谷,不知疲倦的向往与追求,常常使我兴奋不已。还有一层原因,五六十年代写海,写渔民的作家还不多,我想

寻“冷门”，写出点自己的特色，寻找自己在文学上的位子，所以就开始了反映渔民生活的创作，一直到后来有人说我“笔下没有大海浪花就没有激情，心里没有勤劳纯朴渔民形象便失去创作冲动。”^①

《渔岛怒潮》是1962年12月写成，196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主要描写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向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时，逃亡的渔霸与匪特里应外合，窜回解放了的龙王岛，进行反攻倒算，岛上渔民为了彻底消灭敌人，保卫胜利果实，同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展开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斗争，终于粉碎敌人的阴谋，消灭了反革命武装，使龙王岛重获解放。小说塑造了渔救会长王四江、渔霸头子迟龙章以及儿童团长海生和铁蛋、春栓、大贵、桂花，还有麻子副官、小白鞋、二刁蛋等众多的人物形象，出版后便在读者中引起一些反响，值得庆幸的是，在“文革”中免遭批判，而成了当时的四本畅销书之一^②，印行几十万册，全国多数电台都联播过，后来我又把它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

这部小说创作是1959年开始酝酿的，当时文艺界组织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小说所以写得比较成功，首先是我对所反映的斗争生活是熟悉的，并且有过这方面的斗争经历。我在少年时代，经历了旧中国广大劳动人民所经历过的苦难，那种悲愁与辛酸，那种痛苦和折磨，在我少年的心灵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1947年我的家乡被国民党重新占领后，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我经受了这场斗争的洗礼，我的父母就是在这场斗争中遭到还乡团残害。1949年春天，我在南海党校学习，同组里许多学员是青岛武工队的老同志，他们有着丰富的斗争经历，一得空就为我讲述即墨县王村岛里的斗争，我深深被岛里群众在与海匪头子迟彪子（本名叫迟梅章）的斗争中所

① 《他，离不开大海》，1984年8月23日《文学报》。

② 其它三本是《艳阳天》、《沸腾的群山》和《海岛女民兵》。

表现出来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吸引住了，尽管当时我做梦也没想写书，但许多传奇故事却极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待到1959年我开始酝酿写这部长篇时，这些故事便在我脑子里活跃起来。为了获得更多的素材，我又深入到王村岛里，足迹踏遍岛里每个当年斗争激烈的村庄，访问许许多多的老渔救会长及老民兵、妇救会、儿童团和领导岛里斗争的同志。这里从1946年初到1948年一直与海匪、还乡团进行非常残酷的“拉锯”斗争。在深入访问过程中，使我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我常常被一些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激动得难以成眠。之后，又访问在解放战争年代有类似斗争经历的薛家岛、灵山岛、田横岛、竹岔岛。因为我有这方面的经历，又搜集大量素材，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当写到革命干部和群众惨遭敌人迫害时，总是情不自禁地把眼泪滴在稿纸上。书中主要故事情节及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在生活当中都能找到原型，不仅主要人物，就是麻子副官、小白鞋也是如此。

《渔岛怒潮》描写的时间跨度不大（从1947年5月到1948年1月），但非常重要。因为这8个月正是蒋军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并被粉碎的关键时刻。全书着重描绘了以渔救会长王四江和区委书记叶洪山所带领下的军民与迟龙章为头子的反革命势力所进行的激烈复杂斗争，并着重描写一群孩子在战争烽火中成长的过程，以展示革命斗争精神代代相传。从效果看，在我笔下的海生、铁蛋、春栓、大贵、桂花、铁锁等一群性格各异的少年形象较祖辈、父辈形象更具生活实感和活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我当年就属于这个年龄层次，对他们的心态自是感同身受，体验充分，其描写也带有自我写照性。我不仅在战争年代的经历与这群孩子有类似之处，就是参加革命后的15岁那年，我被分配到刚解放的崂山海边工作，在一个风雨的夜里，领导指派我站岗，我既怕匪特突然袭击，又怕神怕鬼，吓得心跳不止，浑身冒汗。这一感受在写《渔岛怒潮》时，就移到胆小怕事的大贵身上了。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号少年主人公铁蛋的性格塑造较第一号主人公海生及成人形象如老会长、叶洪山、二虎等写得更为生动，这是因为我给铁蛋作的性格规定是有严重缺点但正在成长的少年英雄。“因此他可以脱出正常的英雄人物的行为规范。加之作为顽童之典型，他那冥顽不训的天性具有相当大的性格逻辑力量……因而也使作家的笔不得不冲破‘左’的文艺观念束缚，调动其一切有关的生活积累，来充实铁蛋的个性。”^①由于忠于了现实主义真实性原则，从生活出发，按照人物性格设计他的行动——他因受血海深仇驱使对敌人的刻骨仇恨，使得这个孤儿的命运和共产党领导的解放事业结下天缘。但正是自幼失去父母教养的孤儿流浪生活，使他不愿受一切纪律与规范的约束，因此，一度与海生及其儿童团分道扬镳，拉上10岁的铁锁自搞一个“独立营”。这真实地反映了人物性格的内在逻辑走向。甚至连他主动被捕、计骗敌人，以解救乡亲的带有盲动色彩的英雄行为，以及关于狱中恶作剧式的对敌斗争方式的描写，都突破了当时正统的描写英雄人物的规范，充满了铁蛋式的个性特征，因此受到读者的好评，英文《中国文学》曾专门以《铁蛋》为题节译有关章节的十几万字，介绍给国外读者。

由此可见，作品中的一个人物能否站起来，取决于作家的生活积累，艺术功力和审美观念等诸多因素，“三突出”的理论只能把文学引向死胡同。

《渔岛怒潮》共出三版，每次再版，我都作了较大的修改。因为我总觉得，一个作家对待自己的作品要持严肃态度，要对读者负责，尽量使其作品完善些，如此书有机会再版时，我还要修改。有位名家说：艺术是改出来的。这话我信。

《渔港之春》是我计划中的《渔村三部曲》的第二部长篇，全书60余万字，分上下册，197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有的评论家

^① 《山东当代作家论》第413页。

认为,这部小说是“真正调动作者现实生活体验的全部积累从事创作的成果。”时代烙印比写《渔岛怒潮》明显,“但艺术上却胜过一筹”。^①

这部小说是以抗美援朝、镇反和三反、五反为时代背景,反映建国初期渔区商业战线斗争生活的。作品围绕着建立渔业供销合作社,改造渔行,限制利用私人资本主义,避免中间剥削,用社会主义占领商业市场,引导渔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描写战斗在商业战线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同不法资本家和暗藏的阶级敌人的斗争,也批判了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和作风。作品通过一系列尖锐、复杂的斗争生活的描绘,形象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塑造了纪洪涛、林海英和李三旺等许多鲜明、生动的商业工作者的英雄形象。由于我参加农村(包括渔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全过程,应该说写这方面的题材和内容较《渔岛怒潮》所写的题材和内容经历得更直接,体会得更深刻,生活更丰富,而创作经验也更成熟些,所以在小说结构、情节安排,人物性格的刻画,小说的民族传统和“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有机结合、语言技巧和修辞手法等等较《渔岛怒潮》均有长足的进步。但由于这部长篇写于“文革”后期,极“左”思潮的烙印打得很深,以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为理论依据来统帅正面人物的一切言行,也与当时政治界、文艺界同步,把“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和“五种经济形态并存”的观点当作资本主义的施政方针加以批判,并把它当作钱万利等不法资本家猖狂进攻、赵毅等干部“右倾”思想赖以产生与发展的总根子,从而使不少人物性格的描写失去真实性尺度,也使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的性格减少了应有的光彩。文学始终摆脱不了政治因素的影响和社会关系的制约,囿于时代局限,这个失误是很显然的,因而大大影响了作品的真实性和艺术性,所以小

^① 《山东当代作家论》第429页。

说出版后，不久便销声匿迹。教训极为深刻。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认真学习中央的有关文件，对我们国家的历史和自己所走过的道路作了反思，澄清许多糊涂观念，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逐步清除“左”的思想影响，也开拓了文学道路的新视野。从1978年，由于我的精力主要用于所担负的文联行政工作，没有从容深入生活和集中时间创作的条件，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精力也不那么充沛了，但一种使命感驱使着我，我还是用有限的业余时间，见缝插针，不断探索，创作一些新的作品。文学观念的深层变化，不允许作者重复既往，必须不断超越自我，才能使创作上一个新的台阶。但是，在任何时候，任何一位作家，都应该清醒而坚定地立足于最熟悉的情感、经历和生活领域。每一个人都既有他们时代的特点，又有他们不同的风貌和贡献，那才是一个百花齐放，百花盛开的春天。我虽然和“伤痕文学”作家共同经历了“噩梦醒来是早晨”的历史转移，但没有把精力放在呻吟痛苦、抒发迷茫困惑上，而是集中笔力描摹阴霾过后空气更加清新，前景更加开阔的历史新时期那奋发向上的阳刚之气。我于1980年创作的小说《海边老人》，1981年发表的《蜜月》，均是反映新时期渔民生活的。《蜜月》虽是写两个小人物——一对新婚渔民夫妇的喜剧般的生活，但以一种宽松和谐的时代氛围，喜气洋洋的生活气息，蓬勃向上的人生朝气，取代了长篇小说《渔港之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斗争哲学，随时不忘说教的气氛。这是自我超越的一种尝试。而我的中篇小说《小舢公闹海》^①通过“出海”、

^① 此篇原载1983年《柳泉》第3期，收入本书时作了较大修改，改名为《大海在召唤》。

“斗鲨”、“遇险”等情节描绘，在频历险情中展示老艄公宝刀不老，水根和沙春雏鹰展翅，表现他们在新时期奋发向上，知难而进，锐意腾飞的时代精神。

文学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追求、不断寻找，而又没有终点的常新的创作过程，如果这个过程在某一点上停顿下来，凝固、板结、造不出新意，那就意味着一个作家的艺术生命的终结。我在新时期没有满足创作的前、中期以唱赞歌为主调的大合唱，继续推出《渔家》、《两幅画》、《市场内外》、《兄妹俩》、《流逝的岁月》等一组作品，开拓新的艺术视野，去探索历史反思、道德批判和哲理性较强的主题。我在反思历史的同时，也深刻地反思了自己的创作道路，从而使作品由渗透“左”的转向了批判“左”的。而这种批判不是为批判而批判，主旨在于“疗效”。建国以来，特别是“文革”以来，种种创伤在人际关系中结成疙瘩，妨碍我们理顺人际关系和同心协力。我在《渔家》等篇中，强调了人格的道德力量，强调了年轻一代更富于向前看的精神，也特别强调了对历史过错的彻底自省态度。

但这些年来，我也有过困惑，特别是1985年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对中国文坛出现的一些奇谈怪论，五花八门的理论和作品深感迷惑和忧虑，什么文学要“背向现实，面向自我”，还有“淡化意识”、“淡化英雄”、“淡化时代”，等等。“精英”们玩文学，一些人也哄然响应，“玩潮”蜂起，模仿西方现代派中消极成分的或随意胡编乱造竞相弄脏献丑的“精英”作品，被别有用心地大吹特捧，好像比别人高个层次。广大人民在想什么，做什么，喜什么，忧什么，他们以为无关紧要。钻进象牙之塔里造出的一大批“精品”，有的连编辑也看不懂，但为了赶时髦，怕别人讥笑“水平低”，于是有些编辑不懂装懂，在发稿签上堂而皇之地批道：“很好，有新意。”似乎作品愈是为人所不懂，则愈显出作者的思想愈深奥、愈厚实、愈敏锐、愈现代。至于为迎合低级趣味，以凶杀、恐怖、色情、怪诞等等去满足读者的感官刺激的货色，更是屡见不鲜。而按照现实主义精神正儿

八经地深入生活，“直面人生”，充满时代精神的作品却常常受到冷落，被贬为僵化，保守，缺乏现代意识，没有高超的技巧，要想发表是非常困难的。我觉得小说难写了。我没有“闭门造车”的本事，也不想去赶新潮，赶时髦，只好罢笔。大约从1986年至1988年几乎一个短篇都没有写。但是，我坚信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人民大众是生活的主体，也是艺术的主体。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文艺工作者只有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才是大有作为的根本途径。历来成功的艺术作品，都是深刻地描绘和展现社会本相，深刻地揭示生活真实。艺术的光辉倘不贴近现实，则不能激起人们最真诚的感情，担负起给人以鼓舞力量的责任。作家的作品来自生活，并在生活中受到检验，而作品在生活中所引起的反响则是文艺对于作家的一种反馈。一部艺术作品，无论何其高雅，或怎样通俗，无论泼洒多么浓重的色块，当它不为大多数普通人接受时，总是沮丧和尴尬的。沉湎于所谓的自我深层意识的开掘，陶醉于小圈子里的孤芳自赏和互相吹捧，只能使艺术生命枯竭。创作是严肃的。作家必须以严肃的态度创作，不要忘记社会的责任，历史的责任，经常掂掂笔杆子的分量，才能不辱使命。我不为时尚所囿，也不为时尚所诱，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这期间，我一次又一次地深入到所熟悉的渔村，几乎走遍青岛市郊所有的海岛。因为工作忙，每次下去的时间都不长，但哪次都有收获。改革开放给封闭半封闭的渔岛带来的巨大变化牵动着我的心，沸腾的生活深深地触动着我，激起了我强烈的创作欲望。一种作家的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催促着我，我开始酝酿长篇新作。

1989年的春天，我离开工作岗位3个月（这是10多年来第一次集中这么长的时间创作），终于完成了“渔村三部曲”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常乐岛》。

《常乐岛》是描绘改革开放年代渔岛生活的。与《渔岛怒潮》、

《渔港之春》相比，则完全是另一种味道，别一种境界。这里没有那种凌厉拔扬、揭天动地的“怒潮”之象，而是在一种仿佛世外桃源般宁静平和的时空形式中，表现一种悄悄涌动的时代之潮，变革之潮。正是这一时代性的变革之潮，最终打破了常乐岛的静谧，将这个“世外桃源”推到了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面前。我在这部长篇里，写了一些各有特色的常乐人，最典型的是老寿星、黄广兴、魏淑贞、郑春江和黄月华。他们分别代表了常乐岛的五类人，而这五类人构成了常乐岛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漫长而富有层次感的历史图画。

小说脱稿后，我自觉这部长篇较前两部在贴近生活、塑造人物、表现手法和艺术内涵等方面，均有超越，但心里却不踏实，因为再好的书终要有出版社出版，在当前出版事业很不景气的情况下，若干编辑选稿的着眼点首先是作品的“可读性”、发行量，讲的是经济效益。而《常乐岛》是属“纯文学”，能否有人看上是个未知数。因为出版这类作品常常是“亏本生意”，所以对这部长篇的命运，心里无底，稿子抄清后，一直放在家里，也没往外寄。实在是幸运，这年冬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胡德培同志来青岛约稿（我与他并不相识），我怀着不安的心情将稿子给了他，请他提意见，没想被他一眼看上了，而且给了较高的评价，稿子被带回去后，很快就编发了，真是出乎我的预料。我的三部长篇都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编辑们为这三部长篇的出版付出辛勤的汗水，他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我一直充满感激之情。《渔岛怒潮》初版的责任编辑向云修同志已过人世，她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我深深地怀念着她。

我从事文学创作已经三十七八个年头，趁这本集子出版之际，罗罗嗦嗦地写了上述文字，算是对自己所走过的路程的回顾和总结。按照自然规律，人生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然而，我却觉得刚刚起步。